

“CSSCI 来源集刊数据库”首批入选集刊

中國文字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协办

2008年
第二辑 (总第十一辑)



大象出版社

中国文字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 主办
华东师范大学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协办

2008 年第二辑
(总第十一辑)

 大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文字研究·2008年·第2辑·总第11辑/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编.一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12

ISBN 978 - 7 - 5347 - 5418 - 0

I. 中... II. 华... III. 汉字—文字学—文集 IV. H1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208198 号

责任编辑 吴韶明

封面设计 美霖

责任校对 孙红燕 雷红琴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经七路 25 号 邮政编码 450002)

电 话 0371 - 63863551 63863138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 200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90 × 1240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450 千字

定 价 40.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郑州市二环支路 35 号

邮政编码 450012 **电话** (0371)63955319

目 录

文字理论研究

节律性、自足性与自相似性

- 谈谈汉语的特点与汉字的特点 李圃 (1)
论文字生成机制 (二) 何晴 (5)

商周金文研究

- 春秋出土与传世文献第二人称代词研究 张玉金 (19)
金文释词二则 寇占民 (29)
金文考释三则 汤志彪 (34)
金文中的“取贗若干锊”与讯讼无关 王晶 (38)
金文人名“某某父”中排行的计量考察 张再兴 (43)
商代金文文例研究 陈英杰 (53)
西周标准器铭文疏证 (二) 叶正渤 (61)

简牍玺印文字研究

- 战国出土文献字频的初步研究 刘志基 (74)
释《郭店·六德》简 22 “以守社稷” 苏建洲 (87)
战国楚文字常用羨符再探 吴建伟 王霞 (90)
“茜草”考及传统训释补正
——从简帛所见新名入手 沈祖春 (94)
汉墓遣策“襢褕”、“襢褕”小识 孙欣 (99)
古玺文歧释审辨札记六则 周玲 (102)

古文字综合研究

- 石鼓文在历代残存字数的最新考察 徐宝贵 (106)
说“列” 何景成 (123)
楚文字“男”、“耕”、“静”、“争”诸字考辨 孙伟龙 (129)
试述《说文古籀补》在古文字学史上的地位 俞绍宏 (137)

中古汉字研究

- 从唐抄本字书看楷字整理对形音义关系的影响 藏克和 (142)
从字书发展脉络的梳理入手考释疑难字
——简论《疑难字考释与研究》的考释方法 詹鄞鑫 (151)
东汉实物文字的字集字频调查 徐莉莉 (156)
《名义》义项与其字头同考辨 吕浩 (164)
魏晋南北朝碑刻文字中的构件“口” 何山 (168)

- 《干禄字书》及其现代意义探究 赵志峰 (173)
唐代墓志词语释诂七则 柏亚东 (178)

《说文解字》研究

- 《说文》古文与楚简文字合证 王贵元 (182)
简帛医学用字证《说文》释义例 张如青 丁 媛 (185)
《说文》“斐”、“妓”释语新解 王衍军 (189)

语言文字应用研究

- 汉语识字教学法的分类问题 陈黎明 (192)
普通话水平行业测试可行性调查及方案研究 蒋冰冰 王颐嘉 (200)

少数民族文字研究

- 关于民族文字发展研究若干问题的思考 王元鹿 (206)
纳西族古文字类型和起源问题研究述评 和 虹 (210)
哥巴文造字机制研究 邓章应 (217)

CONTENTS

Rhythmicity, Self-sufficiency and Self-similarity—Comment 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Li Pu	1
Comment on the Mechanism about the Characters Comes into Being (II)	He Zheng	5
A Study of the Second Personal Pronouns of the Spring-Autumn Period.....	Zhang Yujin	19
Two Pieces of Explanation Commentaries of Bronze Inscription.....	Kou Zhanmin	29
Three Examinations of Bronze Inscription	Tang Zhibiao	34
In the Bronze Inscription “Taking 飴 Certain Lve”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Lawsuit	Wang Jing	38
Quantitive Research on the Ranking of Name ~ <i>fu</i> in Bronze Inscription	Zhang Zaixing	43
The Study on the Texts of Bronze Inscription in Shang Dynasty	Chen Yingjie	53
On the Verifications of Inscriptions of the Standard Bronze Vessels of Western Zhou Periods (II)	Ye Zhengbo	61
Study on the Unearthed Literature Character Frequency of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Liu Zhiji	74
Interpretation of the <i>Liude</i> Manuscript No.22 “以守社稷” of the Guodian Chu Slips	Su Jianzhou	87
Study on the Common Superfluous Symbols in the Chinese Characters of Kingdom Chu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Wu Jianwei Wang Xia	90
Investigations on Madder and the Supplement and Correction about Its Traditional Interpretation.....	Shen Zuchun	94
Study of Zhanyu (襪渝) and Chanyu (襪渝) in the Qiance of the Tombs in Han Dynasty	Sun Xin	99
Six Pieces of Reading Notes about Distinguishing Right from Divergent Explanation of the Inscriptions on Seals of Warring	Zhou Ling	102
The Latest Study of the Number of Shiguwen (石鼓文) in the History	Xu Baogui	106
The Transcription of Inscription “列” (Lie) on the Oracle Bones	He Jingcheng	123
An Analysis of the Character “男”, “耕”, “静” and “争”	Sun Weilong	129
Evaluating the Status of <i>Shuowen GuZhou Bu</i> in the History of the Studies of the Ancient Chinese Characters	Yu Shaohong	137
Study to the Influence of Regular Script Reform 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Character’s Sound and Meaning and Font from the View of Manuscripts of Character Book from Tang Dynasty	Zang Kehe	142
Textual Research on Problematic Characters Focusing on the History of Character Dictionaries —a Brief Comment on the Way of Textual Research Used in <i>Textual Research and Study of Problematic Characters</i>	Zhan Yinxin	151
An Investigation on Character-set and Character Frequency of Characters Carved on Unearthed Materials in Eastern Han Dynasty	Xu Lili	156
Discrimination of Items of Meaning in <i>Zhuanli Wanxiang Mingyi</i>	Lv Hao	164
The Component “口” of Writings on Inscription between Wei, J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Dynasties	He Shan	168
The Study on the Modern Significance of <i>Gan Lu Zi Shu</i>	Zhao Zhifeng	173
Explanations on Seven Items of Words in Inscriptions of Tang Dynasty	Bai Yadong	178
The Proving between Ancient Prose of <i>Shuowen</i> and <i>Chujianwen</i> (楚简文)	Wang Guiyuan	182
Illustration <i>Shuowen</i> by Using Medical Characters Appeared in Bamboo Slips and Silk Literature	Zhang Ruqing Ding Yuan	185
New Explanation of “Zi”(嬖) and “Ji”(妓) in <i>Shuowen</i>	Wang Yanjun	189
A Question on Classifications of Teaching Approaches to Chinese Literacy	Chen Liming	192
The Research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the Plan of Mandarin Test’s Acceptability to All Walks of Life	Jiang Bingbing Wang Yijia	200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China’s Written Systems Development	Wang Yuanlu	206
An Editorial on the Research of Naxi Ancient Literal Types and It’s Origin	He Hong	210
On the Geba Language Writing’s Graph-formation Mechanism	Deng Zhangying	217

节律性、自足性与自相似性

——谈谈汉语的特点与汉字的特点

李 圃

【摘要】本文从汉语的各类语言结构单位入手，考察了汉语结构在形式方面的节律性与内容方面的自足性，进而指出，这种节律性与自足性是汉语各类语言结构单位共有的自相似性，这就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相对相反，相辅相成，从单音节语素的音与义到句子内部各类结构单位，都以其对称平衡原则共同承担着汉语的表达功能。根生于汉语的汉字也不例外。汉字本体也同样具备自身的节律性与自足性，并与汉语各类结构单位保持着共有的自相似性。也正因如此，充分体现出汉字的本体功能：把诉诸听觉的有声汉语转换成听觉与视觉同步的具象直观汉语。只要汉语生生不息，汉字就相伴而行，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万岁文字。

【关键词】汉语的特点；汉字的特点；节律性；自足性；自相似性；汉字本体功能；具象直观汉语

汉字是根生于汉语的，要了解汉字的特点，首先必须了解汉语的特点。

大家知道，构成汉语的最小单位是语素，所以说，汉语属于单音节语素为主体的语言。其特点是，形式方面具有节律性，内容方面具有自足性，形式与内容相统一，就形成了汉语特有的自相似性。

首先谈谈汉语形式方面的节律性。

汉语节律性表现在音节方面，则是每一个音节都是由声与韵两个部分构成的，即使少部分只有韵母而没有声母的音节，也用“零声母”虚位以待。表现在词的方面，古汉语单音词占优势，汉代以来，尤其是魏晋以来，双音节合成词迅速发展起来，直到近现代双音节合成词取得了优势地位。至于短语、句子则更是节奏鲜明。汉语的这种节律性可以仿用儿歌的节律形式加以概括，即“一而二，二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

“一而二，二而一”：一个音节可以一分为二，分成声母与韵母（调附着于韵母之上）；又能合二而一，成为一个完整的音节。推而广之，双音合成词、短语（词组）也同样可以一分为二，合二而一，即分开来都能两分，合起来都是一个语法单位，而且或联合，或偏正，或主谓，或支配，总是两两相对。

“一二三四五六七”：汉语韵文中的句子可以是由一个单音词或两个单音词构成的句子，也可以是由三个单音词构成的句子，这往往要求有上下对句。三字句，如童蒙读物《三字经》；五字句，如五言诗；六字句，如词曲长短句；七字句，如七言诗。这里应特别指出的是，类似的七言绝句这种节律，早在殷商甲骨文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如《东方曰析》^①：

东方曰析
鹏(风)曰畚(协)
南方曰因
鹏(风)曰𠂇(凯)
西方曰𠂇
鹏(风)曰彝(夷)



【作者简介】李圃，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名誉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 200062）

① 四方风名又见于《甲骨文合集》14295 版，文辞略有不同，兹节录于后：帝(禘)于东方曰析，风曰𠂇；帝(禘)于南方曰因，风曰𠂇；帝(禘)于西方曰彝，风曰𠂇；帝(禘)于北方曰勺，风曰𠂇。详参见李圃：《甲骨文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北方曰勺(伏)鹏(风)曰役(冽)

以第一句为例，可将节律图解成下面的格式：



东方曰析风曰协

这句话可以说是集文字、训诂(某曰某)、音韵、七字句歌诗节奏于一体。

再谈谈四字句。四字节律是汉语节律的主旋律。最早出现的四字句仍是殷商甲骨文。如《受年》^①：己巳王卜贞：(今)岁商受(年)？王乩曰：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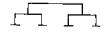
东土受年？[吉]

南土受年？[吉]

西土受年？[吉]

北土受年？[吉]

以“东土受年”为例，可将节律图解成下面的格式：



东土受年

到了西周青铜器铭文中，四字句节律则更为多见。如《虢季子白盘》：“……搏伐厥翬(猃狁)，于洛之阳。折首五百，执喙(讯)五十，是以先行。趨趨子白，献馘(馘)于王。……”又如春秋时的《诗经》四字句，后世的童蒙读物《千字文》、《百家姓》四字句，现代汉语的成语四字格，乃至先秦以来散文中的四字句，当代传媒语言四字句则更为普遍。

其次，谈谈汉语内容方面的自足性。

汉语形式上的节律性与内容方面的自足性紧密配合，相得益彰。

汉语组词成句干脆利落，通过语序等语法手段的使用，即可实现准确表达。以名、动、形为主体的语序排列，其排列本身就是一种特定的语境，在特定语境中的任何一个词均能明确地表现出它的自足性。“强国富民”有时可说成“国强民富”，我们可以利用语序变换的语境确认前者为支配关系的联合而构成的“使成式”语义，相当于说“使国力强大，使人民富足”；而后者为主谓关系的联合而构成的“状态式”语义，相当于说“国家强大，人民富足”。哪怕新的语言组合形式出现，其自足性也是十分明显的。如上海电视台近来推出的名为“最新闻”的栏目。“最新闻”，乍听起来似乎有些陌生，可是仔细一想却又十分贴切。“闻”字在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作𦥑，是商代的一种闻报机构，类似于后世的情报站。西周金文作𦥑，至战国时期出现了从耳门声的“闻”，一直沿用至今。“闻”本为动语素，而商代已用作闻报机构名，成为名语素。“新闻”的“新”属于形容语素，与“闻”组合成偏正式的合成词，用作名词。在“新闻”前加用程度副词“最”，语词结构便立时自动转换成“最新”修饰“(新)闻”的结构形式，正如该栏目录主持人所解说的那样：“最(新)的新闻”、“最(快)的新闻”、“最(有价值)的新闻”。这一变换便构成了一种“隐括式”的语义。隐括式语义更多的是表现在汉语表达的四音节方面。如“打扫卫生”、“恢复疲劳”、“绿化环境”等，属于“使成式”语义结构，犹言“打扫使保持卫生状态”、“使疲劳恢复到不疲劳状态”、“使环境变成符合卫生要求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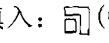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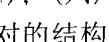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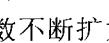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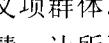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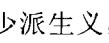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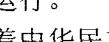
汉语这种形式方面的节律性特点与内容方面的自足性特点结合一体，便形成了汉语内部各类语言单位结构上的自相似性特点。从单音节语素到词、短语(词组)、句子乃至句群，结构上均可一分为二，合二为一，就是自相似性的明证。

现在要说到汉字的特点了。



^①《受年》以及《东方曰析》等篇名均为《甲骨文选注》注者所加。

本文的开头就已指出，汉字是根生于汉语的。汉语的上述特点则要求表达它的汉字也必须具有自身的节律性与自足性，从而具备与汉语相适应的自相似性。汉字的个体是对应单音节语素的，汉字的结构与汉语单音节语素的结构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点。汉语单音节除少数有韵母、无声母的零声元音节之外，大都是声与韵合成的音节。汉字的结构也是如此，除四百多个独体字（古称为“文”）之外，成千上万的字是合体字（古称为“字”）。韵母中又有单韵母与复韵母之分，而合体字中则有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之别^①。如“聲”，殷商甲骨文作𠂔，从𠂔从門，𠂔亦声，其中的𠂔从石、𠂔，生声，是古“磬”字（后世在“磬”下又加“石”而成“磬”）。𠂔（生，或将其视为磬的装饰物）、𠂔（石）、𠂔（𠂔）上下组合，依汉字嫁接规则，可省上之下，与𠂔嫁接成𠂔。这样一来，𠂔（𠂔）、𠂔、𠂔三者各自独立存在时都分别是一个字素，分别构成“生”、“石”、“𠂔”三个独体字，可是进入“聲”字中的造字过程，𠂔、𠂔、𠂔则合成了一个临时组合成的活性字素。磬声清越，以之况声，与另一个字素“耳”构成了一个从耳从磬，磬亦声的“聲”字。再如“德”。“德”可分析成一而二：彳一惠；二而一：德。“德”中的“惠”是一个活性字素。如果“惠”独立存在成为一个字，那么，它又是由“直”（直，春秋战国时出现了“德”的或体作𠂔，上部的𠂔是加注的眼袋形，楷化作“直”，后又作“直”，其中的“目”横写则作“直”）与“心”两个字素构成的合素字（合体字），即“德”的异体字。

汉字的节律性在合体字的结构类型方面体现得特别突出。笔者曾经在《甲骨文文字学》一书中总结了合体甲骨文的七组十四种类型：（一）上下叠置与左右分置：；（二）竖式插入与横式插入：；（三）左下填入与右下填入：；（四）左上填入与右上填入：；（五）上部填入与下部填入：；（六）左部嵌入与右部嵌入：；（七）中间嵌入与中间穿合：。这种两两相对的结构模式，给人们留下的是整齐匀称的节律感和先民对称平衡原则的美学追求。

汉字在内容方面的自足性也是与单音节语素意义的自足性相呼应的。众所周知，单音节语素构成的单音节单纯词，在语言使用中，绝大多数不断扩大其词义的细微差异，从而形成一词多义现象，使每一个多义项的单音节单纯词都具有自身的义项群体。这样复杂的内容由一个具象的汉字来表达，无疑是一个难题。我们的先民以其超乎寻常的智慧，让所造的成字专事同词义的核心（即义核）发生垂直的、隐在的联系，随着语言的发展，不论出现多少派生义，都离不开核心义这个轴心。这正如太阳系一样，以太阳为轴心，带动着太阳系中众多行星的运行。一个拥有多个复杂的义项群体的单音节语素，居然只需一个汉字便能解决问题，古今贯通，传承着中华民族灿烂的文明，这不仅体现了汉字的包容性和自足性，同时也闪耀着先民那高超的思辨智慧的光芒。

以上仅就汉语汉字的节律性、自足性与自相似性谈了一些认识，要进一步了解汉字与汉语的关系，还应根据汉字学元点理论的导引，沿着汉字学特有的“中介思维”路线，弄清汉字的本体功能^②。因为，汉字与汉语之间的特殊关系，存在于汉语单音节语素的“物化”（取象成字）与“物化回归”（成字造义表语素核心义，与此同时，语素音转嫁给成字）的全过程之中^③，也就是把有声汉语转换成听觉与视觉同步的具象直观汉语的全过程之中。所以，可以说，只要汉语生生不息，汉字就相伴而行，成为当今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万岁文字。

^① 字素包含两个系统，一是静态的分析系统，包括基本字素和准字素；一是动态的功能系统，包括稳性字素与活性字素。详见李圃：《字素理论与汉字分析问题》，载《中国文字研究》第二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 参见李玲璞：《汉字学元点理论及相关问题——兼谈汉字认知的若干误区》，载《中国文字研究》第五辑，广西教育出版社，2004年。

^③ “汉字的音是语素音的转嫁”说，是朱德熙先生提出来的。这一论断是正确的。其实，这个问题的提出是数十年思考的结果。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朱先生就读于西南联大时就已关注这一问题了。陈梦家《中国文字学》中录有朱先生在西南联大求学时的一则读书笔记，是朱先生对于“汉字的音是语素音的转嫁”说的先导。朱先生的“转嫁说”，公开发表于第一次汉字问题讨论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收入《汉字问题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语文出版社，1991年。

Rhythmicity, Self-sufficiency and Self-similarity —Comment on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haracter

Li Pu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Characters and Their Applications,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The article research the Rhythmicity in linguistic form and self-sufficiency in content of language structure through kinds of linguistic units in Chinese language and further points out that Rhythmicity and self-sufficiency are common self-similarity in Chinese language units at all levels. This means on the one hand a higher Chinese language unit can divides into two, on the other hand two lower units can combine into one unit. Those units corresponding and opposing and supplementing each other from monosyllabic morpheme to highest unit in sentence structure. All the units carry out expression funct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 of Symmetrical balance. Similarly the Chinese characters have their own Rhythmicity and self-sufficiency and shared self-similarity with Chinese language. So character as a independent unit transforms phonic Chinese language which makes use of auditory sense into one concrete and intuitive that makes use of auditory sense and visual sense. It is no doubt that Chinese character will couple with Chinese language as long as the latter exists and will be one of eternal characters.

Key words: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language; characteristic of Chinese character; Rhythmicity; self-sufficiency; self-similarity; independent unit func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Chinese character concrete and intuitive

论文字生成机制(二)

何 �靖

【摘 要】本文作者认为，现有的关于文字起源和生成的各种说法，都还不能充分说明文字起源和生成的原因。本文提出，文字生成必然遵循一定的机制，大致是由以下三个阶段来实现的：第一阶段，史前人类为了记事、表达感情、审美需求、传递信息、施行巫术等目的，创造了最初的图画和符号，但这些图画和符号不能记录语言。第二阶段，在得到一定发展的农业经济基础上，巫术和原始宗教发展起来，巫师或祭司为了进行人神交流以得到神谕，利用了史前的图画和符号，创造了符号体系——巫师文字。巫师文字基本上不用于人际交流，也还达不到这样的程度。第三阶段，是形成通行文字的阶段，通行文字生成的条件十分苛刻，它需要有相当发达程度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需要有优越的地理条件，需要能利用畜力和运载工具，需要在多个文明之间发展较大规模的贸易，而这较大规模的贸易，正是通行文字形成的原动力。

【关键词】巫师文字；通行文字；较大规模的贸易

三、巫师文字与通行文字的关系

1. 通行文字与文字的定义

通过以上对巫师文字的介绍，可以知道巫师文字只是巫师与神交流的符号系统，还不能用于人际的信息交流。而用于人际普遍信息交流的符号系统，我们可以称之为通行文字。此所谓通行文字，是指这种文字能够灵活、高度适应地记录语言，从而应用于社会的各个方面——经济、政治、宗教、文化及其他领域，即在社会各个领域的信息交流与记录。我们看到，只有把文字形成的过程划分为巫师文字和通行文字两个阶段，才能对文字作出明确的定义，而原来的文字定义并不能完整、全面地概括文字的本质。

B. A. 伊斯特林对文字的定义是：“它是有声言语的补充性交际手段，这种手段在语言的基础上产生，主要用来把言语传到远处，长久保持，并且借助图形符号或形象来表现；通常这些符号或形象表达某种言语要素——一个个最简单的信息、单词、词素、音节或音素。”^①周有光的定义是：“语言的书面符号，人与人之间交流信息的约定俗成的视觉信号系统。这些符号要能灵活地书写由声音构成的语言，使信息传到远方，传到后代。”^②《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定义是：“人类用来交际的约定俗成的可见符号系统。”^③以上关于文字有代表性的三种定义，并不都把文字与语言相联系。王元鹿指出，包括苏联学者在内的东方学者对文字的定义都认为“文字为记录语言的书面符号”，而许多西方学者则未将文字与语言联系起来，这是由于他们认为原始文字“不能精确反映语言”，而是“直接反映意识的”^④。

可以看出，东方学者与西方学者对文字定义的差异在于是否涵盖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显然，东方学者对文字的定义只包括我所划分的通行文字阶段，按照这一定义，则巫师文字就要被排斥在文字之外。而西方学者对文字的定义则包括了文字发展的不同阶段，但正是由于这样的概括，未能作到准确地定义文字，因为巫师文字不是用来进行人际交流的，而是用于人神交流的。

【作者简介】何婧，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中国文字学会会员，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四川 成都 610065）

①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1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分册》“文字”条（周有光撰），第400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2年。

③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文字”条，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

④ 王元鹿：《普通文字学概论》，第20—22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6年。

由此看来，我们把文字发展的过程划分为巫师文字和通行文字这两个阶段是有必要的，这样的划分有助于我们理解文字的本质和更为准确地定义文字。如果我们综合东西方学者关于文字的定义，可以对文字定义如下：

文字是人类用来记录信息的可视符号系统，这个可视符号系统发展到一定阶段，可以记录语言，通过视觉实现人际信息交流、保存信息。

按照东西方学者的定义，巫师文字要被排斥于文字之外，因为巫师文字主要不用于人际信息交流，也不能完善地记录语言。而按照我提出的这一定义，可以把巫师文字包括进去，因为巫师文字符合作为记录信息的符号系统这一条件。同时，这一定义可以把史前人类刻绘的孤立的、单个的符号排除在外，因为这样的符号没有形成符号系统。

2. 巫师文字具有发展为通行文字的可能

如果我们对巫师文字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巫师文字都具有一种发展趋势，即向通行文字发展的可能。但我们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发展趋势仅仅是一种可能性，而非必然性。下面将就我们所能掌握的巫师文字的资料加以说明。

例如早期苏美尔文字，前面已说明是巫师文字，但它后来发展成为楔形文字。这种楔形文字广泛地用于核算一会计、文学等方面，并形成了职业书写的社会集团^①。这种楔形文字后来从苏美尔人那里传到阿卡德的闪米特部落，然后又传给巴比伦人、亚述人、赫梯人、卡斯特人、乌拉图人、波斯人以及西亚其他民族。亚述、赫梯等国进行外交信件来往时，广泛使用亚述—巴比伦文字^②。由此可见，最初是巫师文字的苏美尔文字后来发展成为应用于社会各个方面的通行文字。

古埃及文字最初也是巫师文字，在古王国时期已出现公文和私人书信^③。到了中王国时期（第九王朝至第十三王朝），出现了大量文学作品和商业文书，此外还有宗教的、巫术的、医学的、数学的、历史的和法学的作品^④。这说明古埃及文字已广泛地用于社会各个方面，成为通行文字。

克里特文字也表现了由巫师文字发展为通行文字的趋势。前面已说明，克里特象形文字A和象形文字B都是巫师文字，伊斯特林指出，“线形文字A和线形文字B的许多符号部分保留着的图画性质和这些符号形式同克里特象形字的相似”，证明了线形文字是由象形文字演变而成的^⑤。线形文字A用来表达克里特岛希腊以前的“米诺斯”居民的语言，线形文字B表达的是希腊（亚该亚）语的语言^⑥。这说明克里特线形文字已发展为通行文字。

较晚时期出现的东巴文是现在仍然存在的一种巫师文字，这种巫师文字主要用于书写东巴经文，但后来也出现了用于日常应用的例子。喻遂生指出，已发现的东巴应用性文献有医书、账本、契约、谱牒、歌本、规程，书信、文书、对联、墓铭等^⑦。而由东巴文衍生出来的玛丽玛萨文主要用于记事、记账、通信^⑧。这说明东巴文存在发展为通行文字的趋势。东巴文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通行文字的功能，但由于东巴文化处于强势的汉文化背景之下，纳西族人大都能够掌握汉语言文字，东巴文不太可能进一步发展为传递现代信息的符号系统，只能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而存在下去。

但我们也看到，玛雅文字没有日常应用的文献流传下来，这意味着玛雅文字最终未能发展为通行文字。也许有人会说玛雅文字是由于西班牙人的入侵而中止了发展，如果任其发展下去，有可能发展为通行文字。这种可能是存在的，不过这终究是个推测，从逻辑上看还不具有必然性。

^①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191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 艾伦·加德纳：《埃及语语法导言》，载《世界历史译丛》1980年第2期。艾伦·加德纳指出，第一王朝至第八王朝的残存文献中有公文（见第5页），保存下来的大量私人信件中，有些年代早到第六王朝（第20页）。

^④ 同注③，第2—3页。

^⑤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20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⑥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20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⑦ 喻遂生：《纳西东巴文研究丛稿》，第253页，巴蜀书社，2003年。

^⑧ 周有光：《比较文字学初探》，第321页，语文出版社，1998年。

由此看来，沙巴文、水书等巫师文字能否发展为通行文字，并非必然。如果我们进一步在世界范围内考察古今文字学资料，可以发现曾经存在过为数不少的巫师文字，但它们大多数已消亡了，并没有发展为通行文字。这意味着巫师文字要发展为通行文字，还需要某些条件，而这些条件可能是极为苛刻的。

四、通行文字的形成

1. 大规模的贸易促成通行文字的形成

严格说来，只有当通行文字形成之后，一个社会才真正拥有超越时空进行广泛的信息交流的工具。而通行文字只能从巫师文字发展而来。上文已经指出，巫师文字要发展成为通行文字，还需要某些条件，这些条件可能是极为苛刻的。我之所以认为条件极为苛刻，是基于这样的事实：世界上最早形成的两种文字——苏美尔文字和古埃及文字，其所产生的经济、文化、地理环境等背景因素都十分特殊，甚至是独一无二的。

美索不达米亚与埃及都处于古代地中海文明范围之内。在苏美尔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产生的时代，在世界范围内，除了创造了最早文明的苏美尔人和埃及人外，古代地中海文明范围内也已出现了具有相当文明发展程度的其他民族及其文化。在欧洲出现了基克拉斯文化（公元前 3500—前 1900 年），克里特岛也已进入早期青铜时代（约公元前 3000—前 1900 年）。在西亚，腓尼基古城比布罗斯在公元前 3000 年也进入了青铜时代；位于叙利亚西部的拉斯沙姆拉早在公元前 5000 年就开始发展为城市；在小亚细亚公元前 3000 年建成了特洛伊古城；约旦西部的耶利哥在公元前 3000 年进入了青铜时代；古代巴勒斯坦的莱基遗址，在青铜时代中期出现了城市；伊朗西南部的古国埃兰（Elam），在史前时期的晚期，与美索不达米亚的联系十分密切。这些古代文明，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差不多处于同一时代，苏美尔人和埃及人同这些文明存在着密切的贸易和文化联系。

在古代地中海文明中，以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埃及文明为代表的各文明都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更有效率的生产技术，大大地发展了经济和文化，使得大规模的贸易成为可能。

随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贸易的发展，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从巫师文字演变为通行文字。我们看到，苏美尔文字由图画文字演变为通行的楔形文字，埃及文字由早期的象形文字演变为僧俗通用的圣书体和僧侣体，与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的贸易发展是同步的。这一重要情况说明巫师文字要演变成通行文字，必须要有发展到相当规模的贸易才有可能。

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埃及文明的率先出现，使得这两个文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处于贸易发展的领先地位。因此通行文字最早在这两个地区形成是顺理成章的。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和埃及在与地中海文明范围内的爱琴海、西亚各地区进行贸易时，必然会促成这些地区的通行文字的形成。

苏美尔楔形文字大致从公元前 4 千纪末期开始出现，到公元前 3 千纪中期才发展为较为成熟的通行文字。埃及象形文字也是在公元前 4 千纪末期开始出现，最早的僧侣体在第三王朝时期出现^①，僧侣体可以看作是埃及的通行文字，故埃及的通行文字大致也是在公元前 3 千纪中期发展成熟。随着苏美尔和埃及的通行文字的逐步形成，与这两个地区有贸易关系的地区也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通行文字。以下是地中海—西亚地区各国使用通行文字的情况简介：

公元前 3 千纪初叶，阿卡德人借用苏美尔楔形文字；

公元前 3 千纪中期，以栏（Elam）从阿卡德人那里学会楔形文字；

公元前 3 千纪末叶，巴比伦人和亚述人也使用楔形文字；

公元前 2 千纪初，赫梯借用巴比伦的楔形文字；

约公元前 1750—前 1400 年，克里特文化线形文字 A 通行；

约公元前 1500—前 1200 年，克里特文化线形文字 B 通行；

^①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 161 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年。

吉迦南文字出现于公元前18—前17世纪；

腓尼基文字约出现于公元前12世纪；

公元前10世纪末至公元前9世纪初，希腊人创制了元音—音素文字^①。

以上国家和地区借用或创制文字，都毫无例外地是由于贸易的需要。例如阿卡德人本属操闪米特语的沙漠游牧民族，后来到两河流域北部建立阿卡德城。这里是当时商道的集中点。阿卡德国家的奠立者萨尔贡一世完成了巴比伦尼亚南北的统一，又征服了苏巴尔图(即后来的亚述)、埃兰、小亚细亚、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区。阿卡德王国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交通的发展和度量衡的统一使商业交换日趋频繁，对外贸易远达印度河流域。后来兴起的古巴比伦王国和早期亚述国家的内外贸易都十分兴盛，这是众所周知的史实。赫梯位于小亚细亚的卡帕多细亚，处于黑海、地中海和两河流域之间的要道上，很早就和外界发生贸易联系。克里特岛在公元前2000—前1450年，岛上经济和文化活动频繁，这里是各地商路的汇合点，是欧洲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交流的桥头堡。公元前3千纪闪族的迦南人(即塞姆人)在今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一带定居，建立城邦，这些城邦后又被称为腓尼基。腓尼基诸城很早就有发达的手工业和商业，与埃及、克里特等地有商业来往。腓尼基商人广泛经营海陆贸易，海上贸易独步地中海，在希腊城邦工商业兴起之前，没有任何有力的竞争对手。

以上国家和地区，除希腊外，都是在贸易的刺激下借用或创制了文字。希腊在公元前1200年前后至公元前800年被多里安人统治，经济停滞不前，对外贸易萧条。但伊斯特林指出，希腊文字形成的时期，是腓尼基和腓尼基文字的繁荣时期，希腊文字大概是在爱琴海的诸岛屿上形成的，因为当时这些岛屿处于腓尼基的强大影响之下，或者是在小亚细亚的希腊殖民地内形成的^②。爱琴海诸岛屿和小亚细亚无疑都在腓尼基的贸易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可以说地中海—西亚文明的所有的通行文字，都是由于贸易的促进而形成的，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发达的频繁的贸易，即使已经出现了巫师文字，这些巫师文字也不会发展为通行文字。

地中海—西亚文明之所以有这样发达的贸易，其原因是很多的，自然最根本的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但其独特的自然和文化条件是世界上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其独特的条件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多个文明的并起。地中海—西亚地区在同一历史时期内先后出现了多个地区的文明，这些地区的文明存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频繁交流的可能。

第二，具有便利的交通。这些地区性文明之所以能进行频繁交流，是由于地中海—西亚地区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地中海可以给沿岸国家和地区以海上航行的便利，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和尼罗河不仅给苏美尔人和古埃及人提供了灌溉的便利，还提供了水上交通的便利。

第三，交通和运输工具的发明及其应用。地中海—西亚地区最早利用畜力和车子进行运输。柴尔德(V. Gordon Childe)认为车子起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然后传入欧洲。荷兰学者李特尔(M. A. Littauer)和克伦威尔(J. H. Crouwel)认为无辐车和有辐车均起源于西亚^③。在两河流域的杰姆代特奈尔斯文化时期(公元前3100—前2900年)，车子有双轮和四轮两种，驾车用牛和驴^④。马车大约是公元前2千纪在中亚草原出现的^⑤，至迟在公元前18世纪马车传入西亚的叙利亚和两河流域^⑥。在埃及，随着喜克索斯人的入侵，也在公元前18—前16世纪传入马车^⑦。这些交通和运输工具对地中海—西亚地区贸易的持续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人类贸易行为发生很早，在旧石器时代，原始的交易就发生了。林惠祥指出，在欧洲的奥利摩(通译

^①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183、192、201、271、279、3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②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33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 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载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三辑，第1页，中华书局，2002年。

^④ 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载李伯谦主编：《商文化论集》，第396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⑤ A. H. 丹尼、V. M. 马松主编：《中亚文明史》，第25页，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2年。

^⑥ 王巍：《商代马车渊源蠡测》，载李伯谦主编：《商文化论集》，第398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⑦ 王海城：《中国马车的起源》，载余太山主编：《欧亚学刊》第三辑，第38页，中华书局，2002年。

作奥瑞纳 Aurignacian)文化时代，就已经有贝壳制饰物的交易；制石器的燧石残块常发现于不产燧石的地方，也可以证明在当时燧石也是交易品。在新石器时代，欧洲的亚得里亚海是交易的中心地点。交易在近代的原始民族中也很盛行，如非洲的一部分土著居民有“本能的商人”之称。大洋洲诸岛的土著居民也都能交换各部落所制的不同样式的枪头等物^①。但这些原始交易显然是不能与地中海—西亚地区从公元前4千纪末及其后来进行的贸易相比的。前者是小规模的、零星的，后者则达到相当的规模，对整个社会的经济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由于具有独特的条件，地中海—西亚地区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大约从公元前4千纪末到以后的一千多年时间内，这一地区长期保持了贸易的活跃，因而这一地区的文字得以充分发育为通行文字。

R. 福利(R. Vulli)认为，社会都市化和城市生活的发展是成系统化文字产生的原因。伊斯特林据此提出：“最初表词文字体系产生的主要原因应该是奴隶制的形成和国家的出现，因为它们特别需要规则而准确的文字记录来进行管理，在国家和寺庙的产业中进行计算和统计，满足宗教祭祀的需要，记载法典等。”^②

R. 福利所谓的成系统文字与伊斯特林所谓的表词文字，都是本文所提出的通行文字。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都市化和国家的出现，并不能直接导致通行文字的形成，只有大规模的贸易出现后，才能促使通行文字的形成。最明显的例子是秘鲁历史上的印加王朝，这个王朝延续了约350年，组织十分严密，但没有文字。国王的命令靠口头传达，政府的公文和账册是用绳结(基普)记事^③。又如玛雅文明也建立了国家，也有了文字，但只停留在巫师文字的阶段，未能发展到通行文字阶段。

在古代社会，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固然可以在群体的迁徙过程中发生，甚至战争也可以导致文化的交流，但其最重要的原动力是贸易，特别是异质文化之间的贸易对文化交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贸易最主要的是互通有无，因而能使交易双方均获益。由于人类对利益的本能追求，在具备条件的时候，人们总是要把贸易持续地进行下去。我们应该看到，商品、运输工具、交换方式以及贸易双方人员的接触，同时也是文化的载体和文化交流的形式。因而在大规模的持续的贸易进行中，双方的文化交流能够持续地进行，当然文字的通行化也就能够顺理成章地进行了。

从地中海—西亚地区的贸易中我们看到，文字在贸易中被广泛地运用，苏美尔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都被与之有贸易关系的地区所使用，并且楔形文字和埃及象形文字的发源地和被传入地区在使用文字时又在各自文化的影响下对文字不断地进行改造和完善，演变为不同的文字，同时这些文字又互相影响。由于贸易持续不断地进行，这些文字的改造和完善过程得以较为充分地进行，故能发展为通行文字。例如，苏美尔的象形文字演变为楔形文字，埃及的象形文字演变为僧侣体，楔形文字和埃及文字影响了腓尼基文字等，都是如此。腓尼基文字的形成更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伊斯特林说，腓尼基文字作为一种音素文字，其形成是“因为腓尼基人(在较小程度上还有乌加里特人和迦南人)是西亚贸易最先进的民族。贸易上的利益、贸易记事和计算的需要迫切要求一种最便于学习和使用的文字。字母—音素文字就符合这些要求”^④。这正说明贸易促成了通行文字的形成。

我们也看到，美洲古代印第安人文明的文字未能发展为通行文字，其主要原因就是这些文明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贸易，而之所以没有形成大规模的贸易，在我看来，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这些文明不是在同一历史时期内次第兴起，难以形成大致对等水平上的交流。古代印第安人的文明有玛雅文明、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奥尔梅克文化在公元前3世纪就已消失，可置不论)，玛雅文明的历史比较悠久，大约形成于公元前2500年，在公元前400年建成早期奴隶制国家，在公元3—9世纪为繁荣期，15世纪衰落，16世纪初为西班牙所灭。位于现在秘鲁的印加文明兴起于公元1000年左右(一说1200年)，15世纪初为繁荣期，16世纪下半叶为西班牙所灭。位于现在墨西哥的阿兹特克文

^① 林惠祥：《文化人类学》，第257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

^②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98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③ [秘鲁]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著：《印卡王室述评》，第387—393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④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290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明兴起于14世纪初，16世纪初为西班牙所灭(在阿兹特克文明之前，在墨西哥还有特奥蒂瓦坎文化、米斯特克文化和托尔特克文化等，但这些文化和其他文化交流的情况现在还不太清楚)。可以看出，当玛雅文明兴起1000多年后，印加文明才开始兴起，阿兹特克文明兴起得更晚。而当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兴起后，玛雅文明已经衰落。印加文明和阿兹特克文明虽有不太长的重合期，但不久先后被西班牙所灭。

其次，印第安人的三个古代文明所处的地理环境使它们交流起来十分困难。玛雅文明的中心地带是在尤卡坦半岛。半岛内陆的佩滕盆地，周围山上是茂密的热带雨林；半岛南部低洼平坦，但几乎不存在地上河；半岛北部十分干旱，只有有数的几条小河和不大的湖泊。故西尔瓦纳斯·G.莫莱说：“这个地区脱离了人类交通的主要路线，被灌木丛和沼泽封闭起来。……地区和岛国的性质也助长了玛雅地区行为传统上的封闭性。”^①印加文明大致位于秘鲁高原和安第斯山脉。阿兹特克文明位于墨西哥中南部，而墨西哥的东、西、南三面被三列马德雷山脉所环绕，内部为高原。这些文明所处地区多高原、山脉、峡谷、森林，却很少有可供行船的水道，这使得它们难以进行交流，它们之间的贸易如果存在的话，也不会形成较大规模。

第三，印第安人的三个古代文明几乎没有家畜。美国学者乔治·C.瓦伦特说：“美洲农业的兴旺发达，并没有导致动物饲养的相应发展。虽然，很可能是与移民一同来自亚洲的狗，在全美洲几乎都有饲养，在北美洲，狗是一种驮畜，而在墨西哥却是一种食物。墨西哥人部落和普埃布洛印第安人饲养同样的吐绶鸡，我们现在称之为火鸡。秘鲁人食用豚鼠并饲养骆马和羊驼用以运输和获取绒毛。美索美洲和巴西西北地区都养蜂取蜜。墨西哥南部的一些部落种植胭脂草以获取染料。但是，本来可以像在旧大陆一样有用处的野马，却很快在美洲灭绝了，牛和绵羊也无人饲养。”^②但秘鲁学者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说：“(在秘鲁)有多少看来是人类生活实属必需的东西那里竟然全都没有……首先要说的是，那些人出征打仗或举行庆典没有马，耕地播种没有牛，驮运东西没有骆驼、驴和骡子，没有可供剪毛食肉的西班牙粗毛绵羊和美利奴绵羊，没有可制咸肉干和皮革的山羊和猪；甚至狩猎时没有纯种猎犬……”^③由此看来，印第安人的三个古代文明基本上没有可提供畜力的家畜，这显然不具备大规模贸易的条件。

第四，印第安人的三个古代文明没有车子这样的陆地运输工具。印第安人的三个古代文明有船，例如乔治·C.瓦伦特提到阿兹特克文明的特诺切蒂特兰城“在适当的地方，有固定的公用小船”^④。尽管有船，但由于没有较长的适于通航的水道，不能进行大规模的长途运输，也未见用船来进行海上航运。主要是由于陆地运输工具的缺乏，因而不可能形成大规模的贸易。

由于以上原因，这些古代印第安人的文明都处于相对封闭的状态。其中的阿兹特克文明有一种图画文字，玛雅文明也有自己的文字，但都是处于巫师文字阶段。这也使我们认识到，即使在比较封闭的地区，也可能产生巫师文字，但不能够形成通行文字，通行文字必须要在大规模贸易的条件下才能形成。

以上是对地中海—西亚地区通行文字形成过程的宏观说明，下面还要就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演变为通行文字的过程作微观的说明。

2. 贸易是苏美尔文字演变为通行文字的原动力

苏美尔人大约在公元前4500年来到美索不达米亚，逐渐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建立了城市国家，在公元前3000年苏美尔地区已经出现了12个城市国家。美国学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指出，苏美尔人在公元前4千纪时已经取得巨大的农业技术进步，开掘沟渠，进行灌溉，农业产量大大增加；掌握了冶金术；在公元前3000年，犁已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普遍使用；早期的帆船开始出现；发明了车轮，到公元前3000年时，已将轴装到手推车上；陶轮的发明，使陶器能够成批生产^⑤。斯塔夫里阿诺斯还指出：

^① 西尔瓦纳斯·G.莫莱著，文静、刘平平译：《全景玛雅》，第13页，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3年。

^② [美]乔治·C.瓦伦特：《阿兹特克文明》，第16—17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③ [秘鲁]印卡·加西拉索·德拉维加著：《印卡王室述评》，第689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

^④ [美]乔治·C.瓦伦特：《阿兹特克文明》，第145页，商务印书馆，1999年。

^⑤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要、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第108—111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美索不达米亚）世俗的国家和帝国兴起后，非农业商品的产量大量增加。陶器的成批生产，诸如圆柱形印章和金属器具等物品的普遍使用，以及在某些较坚固的住房内发现的大量的各式各样的物品——这一切说明，当时出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中产阶级的新市场。人数渐增的宫廷官员们要享用大量的奢侈品；不断发展的军事化需要各种武器，而且规模空前，不但需要大量的金属武器和盔甲，而且还需要像战车一类更为完善的军事装备。……大量生产与外交事务有重大关系。地势很低的流域地区几乎不出产各种矿物和优质木材，大部分手工业的原料要靠从外面运来。例如：铜来自波斯湾南面的阿曼，银和铅来自小亚细亚的托鲁斯山脉，木材来自伊朗的札格罗斯山脉和地中海沿岸的黎巴嫩。为了偿还这些进口原料，就必须扩大生产，提供各种出口产品作为交换。^①

公元前3千纪的中叶，乌鲁克的统治者统一了苏美尔地区。考古发掘出来的这一时期的城邦如乌尔（Ur）、拉格什（Lagash）、埃立都（Eridu）、乌玛（Umma）等，出土5万多片泥板档案，内容有宗教和实用文件，包括法规、讼事、遗嘱、账目、契约、收据、书信等。陈晓红、毛锐指出：

美索不达米亚工商业发展的顶峰应属巴比伦时期。由于两河流域南北的统一，城市经济的发展，大大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巴比伦城成了全国贸易甚至是国际贸易的中心。以至于有人说，巴比伦文明本质上是商业文明。的确，流传下来的文献，大多带有浓厚的商业色彩。就国内贸易而言，从大量的借贷、契约、合同、期票的泥板文书，可以看出当时商业活动的频繁程度。^②

这些泥板文件的大量出现，说明苏美尔文字已经转变为通行文字。这些泥板文件上的文字都是楔形文字，则我们可以说苏美尔文字发展为通行文字，是在形体上表现为楔形文字。那么，苏美尔文字是怎样成为楔形文字的呢？

一种说法是楔形文字由图画形一类的符号演变而成，由于书写工具和技术的改变而演变为楔形文字。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苏美尔文字是乌鲁克出土的属公元前3200—前3000年的所谓“古朴泥板”上的文字，约有1200个^③。德国学者法肯斯坦和苏联学者季亚康诺夫把这些“古朴字”分成三类：第一类是表示整个一组画的，这样的符号不多。这些符号从乌鲁克第三分期（公元前3100—前3000年）开始就消失了。第二类是表示单个实物和动物的真实而详细的图形。这些符号的数量要多得多，其存在的时间比第一类符号也要长得多，一直到詹姆迪特纳斯尔时期的最晚层（公元前3千纪前半期），但这类符号逐渐简化，或者被更简单的符号组合所代替。第三类符号是最简单的图示符号。这些符号在乌鲁克第四分期（公元前3200—前3100年）的符号中占多数，后来它们把第一类符号和第二类符号排挤了出去^④。伊斯特林认为楔形文字就是由这些图画形和线条形的符号演变而成的，他说：“古苏美尔人的文字由图画形和线条形的符号过渡到约定的楔形的符号，通常解释为因书写工具和技术的改变，由削尖的芦苇秆在泥板上‘画’符号过渡到带三角形尖头的芦苇秆在泥板上压刻出符号。也有人把这种书写技术的改变解释成因粘泥的性质：因为粘土的粘性不能很快在泥板上‘画’直线，更不能‘画’出曲线；书写人用芦苇秆在软泥上刻画楔形符号，就可以快得多了。毫无疑问，泥板的使用大大促进了苏美尔字变成约定的楔形笔画的结构。”^⑤

另一种说法是美国学者B. 谢拉提出的，他认为楔形文字起源于图画，而孕育了楔形文字的这个图画文字阶段，已随着易腐烂的材料而永远消失，不可复得了^⑥。但如上所述，乌鲁克出土的文字中也有描绘实物和动物的图形符号。为什么楔形文字要从已消失的图画文字中产生，而不从乌鲁克文字中的图形符号中产生呢？这一说法似未能作出完满解释。

^① [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要、梁赤民译：《全球通史——1500年前的世界》，第113页，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② 陈晓红、毛锐：《失落的文明：巴比伦》，第5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③ 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65页。

^④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124—12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⑤ B. A. 伊斯特林著，左少兴译：《文字的产生和发展》，第16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⑥ B. 谢拉：《他们在泥上书写》（B. Chiera, *They wrote on Clay*），第50、58—60页，芝加哥，1938年。转引自拱玉书：《楔形文字起源新论》，载《世界历史》1997年第4期，第59页。